



在经济学中，像在其他科学学科中一样，一个概念以你的名字而命名，是一个人成就和荣耀的标志。按着这个标准来说，斯坦福大学的约翰·泰勒，则是他一代中最有成就而受人崇敬的宏观经济学家之一。的确，以他名字

货币政策规则。’他的兴趣和受过的训练定然会指引他做出这样一个贡献”。

泰勒认为，他的学术工作为其发现奠定了基础，但真正使他产生实质进展和突破的，是他在华盛顿美国白宫

对规则的追寻

命名的一些概念，所带来的影响已变得如此深远，以至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Federal Reserve, 简称Fed) 主席本·贝南克调侃说：“我们的胃口已经被泰勒规则、泰勒原理、泰勒曲线吊了起来，我们现在期待着泰勒格言、泰勒双曲线，甚至泰勒之谜。”

泰勒规则以及一些最为出名的相关概念，实际就是一个简单的方程。这个方程式是1992年泰勒为解释面对通货膨胀和商业周期，美联储的利率目标应如何做出反应而提出的。方程成功地描述了美联储是如何设定利率目标的，同时也为美联储下一步应该和可能如何行动开了一剂处方。方程迅速获得了广泛认同，成为各国中央银行政策的一个有益指南。

那些熟悉约翰·泰勒的人，并不会为其成功而感到惊讶。去年，在一次为表彰泰勒贡献而在达拉斯举行的会议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第一副总裁，同时也是泰勒研究生时代的同窗 John Lipsky 说：“如果要是有一个有关当年我们这伙斯坦福的博士的年鉴的话，约翰·泰勒图片下的说明文字可能就是：‘最有可能搞出一套成功的

经济顾问委员会 (CEA) 工作所获得的政策经验，他告诉《金融与发展》杂志，“要是没有在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政策经验，我都怀疑我会产生这个思想。”事实上，泰勒能够轻松游刃于学术界和决策层，这已经成为他职业生涯的特征，最近，他又被任命为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高级官员。在学术界，他充满激情投身于教学和研究工作，这时他看起来一点都不像一个华盛顿的决策官员：曾经在课堂上，为了解释好农业供应和需求，抓住学生们的注意力，他穿着加州的葡萄服，用歌手 Marvin Gaye 哼唱“我是从小道消息听来的”那样的调子，激情地跳跃在讲台上。

Prakash Loungni 对约翰·泰勒 的采访

台上。

从随意的货币政策到遵循规则

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联储和其他各国央行的运作，还笼罩在一股神秘之中，货币政策被认为是一个深奥问题而最好留给技术专家去决断。但问题的关键是，这些技术专家的自由裁量，往往带来的是代价高昂的错误决策：例如，在经济大萧条时期，美联储的政策是踩刹车而不是

踩加速器，使得经济更为恶化，又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大通货膨胀时期，美联储使通胀率达到了两位数。

按照保守经济学家如已故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观点，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是让美联储遵循相当刚性而严厉的规则。事实上，弗里德曼曾几十年来一直在呼吁，美联储应将货币供应量的年增长率保持在3%—5%的固定速度上，这等于说可以把整个货币政策的制定交给一部电脑计算就可以了。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美联储遵循这样一个以货币供应量为基础的规则时，它表明是不成功的——货币供应量与经济的短期关系极为不稳定，这对货币政策的制订来讲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指导原则。

对于弗里德曼主张货币政策制订应该遵循规则而不是随意裁量，泰勒深深赞同，在年轻一代保守的宏观经济学家中，他感兴趣并致力于发展出更优的货币政策规则。他拥有出色的经济学技能和训练，这使他能够作为一个领跑者，创造出一套切实可行的货币规则。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普林斯顿念本科时，约翰·泰勒就写了一篇模拟不同经济政策条件下经济的不同反应的高级论文，获得广泛赞誉。在此基础上，他又来到斯坦福读研究生，在那里，他碰到许多著名的统计学家如T.W. (Ted) 安德森等人，对所谓的综合估计和控制问题——同时对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最优选择建模的尖端统计方法，有了更多的学习和掌握。

在哥伦比亚大学，他获得了研究生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他与艾德蒙·菲尔普斯共事——后者因为创造出价格和工资刚性的综合模型而成为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当时流行的学术思潮是，假设价格和工资都是灵活的，对这一点泰勒保持着反思态度，他用更现实的态度来建立其模型，使这些模型更适用于美联储和其他各国央行的现实情况。

泰勒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光是令人难忘的，因为当时的学校学术氛围非常好，他成天能接触到“那些已经建立起声望的知识明星，像艾德蒙·菲尔普斯和菲尔·坎根等人，以及那些正在形成名气的知识人，如卡尔沃（《金融与发展》2007年3月号经济学人物），还有Carlos Rodriguez等等。”后来泰勒和卡尔沃的学术成就，都在刚性的价格和工资方面取得了突破。的确，不管是“泰勒定理”还是“卡尔沃定理”，都表述的是工资和价格的刚性，这两种定理已经成为一种可以互换的说法，并且都已经进入我们的经济学词库。

泰勒规则

那还是在泰勒两次担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之间，使他发现了货币政策制定的更为现实的一面。1976—1977年，作为经济专家，他深深地认识到，诸如潜在国

内生产总值（GDP）和自然失业率这些经济概念的估量，对于货币政策的运作是多么的重要。他说，这段时间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把对美国自然失业率的估计从4%提高到4.9%。“那些政治人物害怕自然失业率升到5%,”泰勒笑着说，“这就有点像加油站的汽油价格在1.995美元/加仑，而不要涨到2美元。”

1989年，泰勒由哥伦比亚大学回到斯坦福大学——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任命他为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三名成员之一后，他又回到华盛顿。其职责就是充当政府当局与美联储之间的联系人。“我看到美联储的行为不再如经常被形容的那样混乱和随意。从与我交谈过的美联储官员身上也能看到他们正力图用理性而系统的方法对经济事件做出反应，”泰勒说。

“泰勒方程本身就是简单，简单到可以直接把它印在泰勒自己名片的背面。”

唐纳德·科恩（Donald Kohn）长期担任美联储官员，现在是该委员会的副主席，他回忆起那些与泰勒的交谈：“20世纪的80年代，当约翰任职于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时，无论他是在华盛顿的办公室、斯坦福的教室里，或者在密密麻麻的全球会议里，还是在华盛顿和帕洛·阿尔托（Palo Alto）的餐桌上，或者在从佛蒙特州到怀俄明州的远足途中，我们这些美联储官员都不敢掉以轻心，放松懈怠”。

1991年，他第二次任职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快到期时，泰勒开始认真思考如何建立“一种简单而实用的规则”——就用一个方程，不仅有助于外界了解美联储是如何运作的，还能给美联储自身的表现提供一个衡量基准。泰勒是在1992年11月卡内基—罗彻斯特会议上，公开推出这个方程式的，并很快得到各方喝彩，不仅在学术界，还包括决策界和私营部门。当时在所罗门兄弟公司任职的约翰·利普斯基，早就竖起了大拇指“在我们1993年12月发布的预测报告中，我们就利用泰勒方程通告我们的客户，货币紧缩政策既已逾期，且迫在眉睫，”在去年的达拉斯会议上，利普斯基说，“事实上，美联储在1994年2月确实收紧了政策，这混淆了市场的认识。”

泰勒方程本身就是简单，简单到可以直接把它印在泰勒自己名片的背面（见专栏1）。它表明，1987—1992年，美联储政策工具、美国联邦基金利率（Federal Funds Rate指美国同业拆借市场利率——译者注）的设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

- 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接近2%的幅度。如果通胀率稍稍高于2%，联储应倾向于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以冷却、压住通货膨胀。

• 国民经济的实际收入与潜在的国民经济收入距离有多远。如果实际国民收入低于潜在的国民收入,美联储应该倾向于降低目标利率,以刺激经济。

泰勒还说,如果他提出的方程在20世纪70年代就得到坚持,美国经济的表现会比当时的情况好得多。当时的通货膨胀也不会彻底失去控制,因为通货膨胀率每超过2%以上,美联储就会以高于拟议的比率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以做出回应——用高于拟议的比率提高联邦基金利率以医治通货膨胀,这已成为泰勒原理的一个显著体现。

根据泰勒规则的原理,泰勒给最近几年美联储的打分并不很高。去年,在怀俄明州Jackson Hole的年度经济会议上,泰勒表明,2002—2005年间,依据他的方程原理,美联储提高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的速度过慢。泰勒讲,假如当时美联储遵循了他的规则,房地产的繁荣以及随之而来的泡沫也许能够减轻甚至避免。

为什么这样一个简单的方程式会作为一个成功的货币政策规则而获得了广泛认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泰勒研究过更大规模和更为复杂的全球经济的多国模型,尤其是在那个时候,很少有其他宏观经济学家在做这些,他在这一方面建立起了声誉。安久·莱文(Andrew Levin),是泰勒曾经在斯坦福大学培养的一个研究生,他现在就任于美联储的一个高级职位,他讲,泰勒总是以“挑战斯坦福大学的超级电脑的极限”以解决他的模型而闻名。正是这样一个提出一个如此简单规则的人给斯坦福大学带来了别人所不能带来的荣誉。

千头万绪之间合作

2001年,泰勒回到华盛顿,这次是就任美国乔治W·布什总统届内的财政部副部长,负责国际事务的处理。他

的工作中心在于重获各国财政部长的政治支持,共同冻结9·11恐怖袭击事件后恐怖分子们的资产。泰勒说,他感到自豪的是9·11委员会的成立,该委员会负责检查政府对袭击事件的回应,并将冻结恐怖分子资金的工作视为反恐战争中头等重要的一件工作。

这次泰勒也必须与各国的中央银行打交道,但是却在—个非常不同的背景环境下。他负责监督在伊拉克建立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和引入一套新的货币——伊拉克第纳尔,这些工作都面临着巨大挑战。该项任务很艰巨也很复杂,在萨达姆·侯赛因政权2003年倒台之前,萨达姆·侯赛因从央行金库里取走了价值10亿美元的货币。这意味着,如果新的货币不成功,或者人民用它来兑换美元或欧元,中央银行就没法对其进行通融了。“伊拉克央行的外汇储备被耗尽,这样一种境况足以让一个像我这样的货币经济学家不寒而栗,”泰勒在他2007年撰写的《全球金融的勇士们》—书中这样写道。当埋藏在萨达姆宫殿底下的大部分盗款被发现时,泰勒希望这些款项能重新返回央行。不过,他说,“对大多数人来讲,将这些资金用于重建项目”,像供水系统、公共卫生设施的修缮,则不失为更好的主意。

因此,伊拉克引入新的第纳尔不能有任何闪失。新的货币“可以填满27架波音747飞机”,它们从伊拉克七个不同的印刷厂印制出来,由武装护队押运到全国240个点,流向全伊拉克。幸运的是,新的第纳尔是成功而受欢迎的,人们已经开始用美元去兑换新的第纳尔,这样,伊拉克央行的外汇储备就开始逐渐上涨。“当伊拉克央行的外汇储备量闯过10亿美元的大关,我才深深松了一口气,”泰勒在他的书中这样写道。

泰勒在伊拉克的努力和成功,使他获得了美国财政

专栏1

泰勒规则的相关概念

现在所谓的泰勒规则,实际就是一个简单的方程式,它是1992年约翰·泰勒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并在1999年的一本书中阐述的,这就是:

$$r = 1.5p + 0.5y$$

其中,r是美联储的实际联邦基金利率与其长期平均利率目标的离差,P是实际通货膨胀率与目标通货膨胀率的离差,而y是实际和潜在国民产出的差距。联邦基金利率是指美国同业拆借市场的利率,是一家存托机构利用手上的资金向另一家存托机构借出隔夜贷款的利率,是美联储推行货币政策的重要市场工具。

作为—剂处方,这个方程表示,如果实际通货膨胀率高于央行的(明示或默示)目标通货膨胀率,或者实际国民产出超过潜在国民产出,美联储就应该把目标利率提高到高于一般平均利率的水平。

总而言之,这个方程告诫美联储应该“望风而动”。同时,这个方程也体现了那个闻名于世的泰勒规则:中央银行应该以更于提议的比率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以回应和治理升高的通货膨胀。

泰勒说,这个方程也描述了1987—1992年间联邦基金利率目标的实际变动,他说,这段时期货币政策表现优秀、得到认同,实际也是有意无意遵循了这个方程的结果。

虽然泰勒是因为这个“泰勒规则”建立起学术地位的,但约翰·泰勒作为声誉远播的宏观经济学家并不是单靠这一点。20世纪70年代,他就在做现在被称为泰勒曲线的研究,类似于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这也是研究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关系的。但是,菲利普斯曲线只是提出了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的水平关系,泰勒讲,实际中,政策制定者所要面对的利弊权衡主要存在于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波动之间。一个好的央行政策不但要降低通货膨胀率的波动,还要降低失业率的波动,从而来优化这种权衡。

部的“杰出服务奖”。回首他在伊拉克的工作，泰勒感叹“那是需要多大量的国际与外交合作啊”。他说，冻结资产的工作最终包括了180多个国家，“这是，至少是布雷顿森林机构以来，国际合作史上的一个杰出例子”。

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新规则

泰勒就任于美国财政部期间，他也因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努力而闻名。基于他的强调“以规则为基础的政策制定”的主张，泰勒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问题之一，就是其政策制定缺少系统和连贯性。它究竟能不能造福于一个国家，帮助其摆脱困境？它什么时候才能作到这一点？”他感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行为缺乏系统性，这加剧了市场的不确定性，这也是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危机为什么具有“那么大的传染性和连锁性”的原因之一。

泰勒因此坚决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用他的话说，就是“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行为遵循更多的规则”。这就包括在2003年展开的关于一个国家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资格才能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额贷款的标准的讨论。在2005年的一篇文章中，泰勒写道：这

专栏2

打破规则

当谈到经济学教学时，约翰·泰勒坚信的一条，就是打破规则、不寻常规。大多数人回忆起他们学经济学课程时的情况，脑子里泛起的常常就是一个没精打采的教授在讲台前嗡嗡地念叨着一些抽象的概念。泰勒认为，经济学教授“应该使经济学教学有趣而不枯燥，真正做到寓教于乐，使抽象的经济学概念变得鲜活好懂”。

除了把他的教学思想写进他那本热销的经济学教科书(现在已经是第六版了)外，泰勒还经常在学术会议上通过论文的形式来与同行交流经验。在一篇会议论文中，他讲到，经济学教授教学应该采用启发式的方法，使那些经济学概念不那么抽象，更加直观，更加切合实际，并让人容易记住。泰勒为了践行他的教学精神，使他的课堂活泼生趣，他曾经在课堂上穿上加州葡萄服、用“亚当·斯密”式的激情调子上他的课。

他对教学的倾注，使整整一代斯坦福学生都记住了他，并为他赢得了“教学奖”，但他说，他最有名的一个学生是一个离开斯坦福的学生。1995年秋季，泰勒的一个学生听完了泰勒的经济学入门课程不久就离开了斯坦福，那个学生就是高尔夫球手泰格·伍兹。“也许我把机会成本的概念解释有点太清楚了”，泰勒开玩笑说。他说，他现在给新生解释机会成本的概念时就用伍兹的例子。对伍兹来讲，与留在斯坦福相比，从事高尔夫球运动会失去4000万美元左右的收入。“他们很快就能理解这个概念”。

样一场大额信贷资格标准的讨论，将有助于“减少不确定性，使决策者和私人投资者有更正确的目标和动机”。出于同样的原因，他还倡导对主权债券中的集体行动条款进行修订，这旨在对债务重组事件的发生提供更大的可预测性。这类的条款在2003年已经被用于墨西哥政府债务问题的解决，并且自此以来已经成为一种市场标准。

泰勒在这些方面的工作受到媒体的广泛报道，并且把他的形象对立干于安尼·克鲁格。安尼·克鲁格，是泰勒当年在斯坦福大学的同事，现在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他的主张是设立一个集中统一的主权债务重组机制。泰勒说，他是反对设立这样的一个机制的，但是在《全球金融的勇士们》一书中他写道：“人们认为安尼·克鲁格和我有某些个人宿怨，这是荒谬的……我们一起在马里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布雷顿森林高尔夫球场打高尔夫球，就像我俩在加州的斯坦福大学的课程比拼一样。这就正像在学术界一样，学术观点上有分歧，并不妨碍成为亲密朋友”，那谁是高尔夫的赢家？“我俩比赛最后往往都是平手，”泰勒说。

2005年，泰勒还倡导了一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支持计划”，他将之称为“一项不用借贷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这项计划已经在佛得角、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等国实行，泰勒认为这项计划能使各国受惠，比如即使当它们没有金融困难时，也能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的经济改革意见。泰勒写道，“要是没有这样一个计划，直接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贷，只能成为困难国的惟一的出路”，也成為了最后的救星，好像这样就告诉市场和捐助者，他们已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了“特别通行证”。

斯坦福与华盛顿之间

2005年，泰勒说，在美国财政部4年的任期已满，现在是时候回到斯坦福大学了。年仅61岁的他，再度活跃在教学(见专栏2)和研究领域，同时还在继续留心观察美联储的行动。在最近全球经济动荡的环境下，他是支持美联储的行动的，包括美联储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对联邦基金利率的75个基点的下调。泰勒告诉《金融时报》，这次下调“推动了将要发生的事情的发生，在艰难的市场时刻做出这一点，我认为是一件正确的事情。”

今年，像前几届美国总统竞选年一样，约翰·泰勒又开始忙着给共和党人作经济顾问。他频繁地往返于斯坦福和华盛顿之间，现在正在为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的竞选而工作。当被问到选举的猜测结果时，泰勒笑着说：“对不起，我还没有一个能够用来预测政治选举结果的泰勒规则！”

Prakash Loungni，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外关系部主任。